

新社学术丛书第三种

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

王慷鼎

新加坡新社

新社学术丛书第三种

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

王慷鼎

新加坡新社

新社学术丛书第三种
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
王慷鼎

新加坡新社出版

ISLAND SOCIETY

Pasir Panjang P.O. Box 34

Singapore 9111

Printed by **TIGER LITHO OFFSETING PTE LTD**

30, Kallang Pudding Road #05-04

Singapore 1334

1987年3月

ISBN 9971-84-810-4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本书蒙新加坡艺术理事会
赞助出版，谨致万分谢意

目录

| | |
|--------------------------------------|-----|
| 大众传播研究的新方向····· | 1 |
| 从《察世俗》到《东西洋考》： 马、印、新华文杂志发源研究····· | 9 |
| 新加坡报业的起源····· | 21 |
| 新加坡第一份华文周报《日昇报》····· | 35 |
| 《叻报》创刊日期正式确定····· | 43 |
| 《南洋商报》战前历任编辑主任····· | 49 |
| 报人曾圣提····· | 89 |
| 《中国日报》探微····· | 95 |
| 《中南日报》初探····· | 105 |
| 战后十五年新加坡华文报刊析论 (1945—1959)····· | 127 |
| 后记····· | 167 |

大众传播研究的新方向

大众传播这个名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出现，並很快受到广泛接受和应用。现在它已经是一个普遍的日常用语了。所谓大众传播，是指通过报章，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电影、唱片，甚至广告、公共关系等媒体或手段，而把一定的意识内容，传播给无限量的读者，听众或观众的一种活动。

根据这个界说，大众传播研究，自然是针对这种种传播媒体的发源与发展，传播内容，传播过程的基本要素以及大众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等，加以有系统的调查和分析。研究的目的，除了当作人类文化的一个环节，以历史的眼光，加以记录保留，维持人类文化流源之外，还有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以求改善大众传播活动，提高大众传播功能的作用。这不仅是大众传播研究的目的，也是人类行为，社会体制研究的共同目的。

从这个内涵来看，大众传播研究，可以说古已有之，不是今时今日的特殊社会产物。不过，由於时代的演进，大众传播媒体的不断发展和刷新，以及不同媒体的不同功能，大众传播研究的范围与重心，也隨着不断改变，不断扩大。

大致上，近百年来的大众传播研究，有三个明显的主流，即大众传播发展史的研究，大众传播过程基本要素的研究以及大众传播政策的研究。大众传播政策的研究，是近十年新兴的研究趋向，也就是本文题目的指的新方向。

大众传播发展史的研究，流源最早，迄今不断。大众传播事业发达的欧美国家，固然如此；而在近代科技方面受西方影响深远的亚洲国家，亦复如此。只是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方面，有所差异，有所偏重。

欧美国家，可以用美国做例子。由於大众传播事业的发达，大学教育的普遍，研究风气的鼎盛，加上人力财力的雄厚，美国在大众传播发展史方面的研究，可以说不遗馀力，成绩辉煌。研究的范围，由名报人的传记，个别著名报章、杂志的历史、少数民族的报业史（如美国黑人报业史，美国德文报业史、美国华人报业史等），区域性报业史，全国性报业断代史，全国性个别大众传播体系发展史（如报业发展史，杂志发展史，广播与电视发展史，电影发展史，广告业发展史等等），以至全国性整体大众传播媒体发展史，可以说洋洋大观，应有尽有。既博大、又精细。

亚洲方面，中国，日本和印度，都曾下了不少功夫，只是量方面，没有美国那么多；内容方面，也不及美国的博大精细。以中国来说，比较深入的还是报业史方面的研究，如一九二七年出版的戈公振《中国报业史》、一九三一年的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一九四〇年的赵君豪《中国近代之报业》，以及一九六六年的曾虚白《中国新闻史》，便是例子。至於其他方面的研究，如报人传记，个别大众传播媒体发展史，区域性大众传播媒体发展史等，却不多见。

大众传播研究的第二个主流，完全跳出“史”的范围，而从行为科学的立场，融汇了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理和研究方法，来探讨大众传播过程的基本要素，了解大众传播对读者，听众或观众的影响。这个主流，导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交战国宣传技术的利用，演发成为针对报章，杂志及小册子的宣传内容和技巧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於大量消费产品的出现，消费主义的产生，市场调查研究和广告传播效能研究应运而生，助长了这个主流，使之盛行不勃，以迄於今。

所谓大众传播过程的基本要素，可以用舆论学和传播学权威拉斯威（HD LASSWELL）的一句来代表说明：“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这句话就包含了大众传播过程的五个基本要素在内。

1. 谁 (who)

2. 说些甚么话 (says what)

3. 采用何种媒体 (in what channel)

4.对谁说话 (to whom)

5.会产生何种效果 (with what effect)

如用大众传播研究的术语来加以说明，“谁”就是“传播人”的研究；“说些什么话”就是“内容”的研究；“采用何种媒体”就是“媒体”的研究；“对谁说话”就是“读者、听众或观众”的研究；“会产生何种效果”就是“效果”的研究。

传播的最终目标，是影响读者，听众或观众，不但使他们明白所传播的意识内容，同时还希望他们接受这种意识内容，甚至进一步根据这种意识内容，发为行动。这是传播效果的极峰，也就是大众传播过程基本要素研究的核心工作。

可是，随着国家发展的需求，加上大众传播媒体的日新月异，传播范围的无限扩大，传播功能与传播目的的基本改变，历史的研究和传播行为的研究，已然不能满足实现的需求，而有大众传播政策研究的出现。

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是说明过去的事实，为文化的发展保留一个根，它无法直接协助解决当前大众传播的种种现实问题。而行为的研究，虽是以当前的大众传播问题为核心，但却以既成的现象以及个体和细节为重心，没有照顾到大众传播整体系统的策划和发展的的问题以及在全面策划和发展的情形下，大众传播系统对国家建设（包括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两方面）所可能发生的积极影响。而在目前的世界经济发展，以及拉平贫富悬殊的工作中，国家建设（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建设）和大众传播在建设过程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却是一个重要和迫切的课题。这是大众传播政策研究出现的基本理由。

大众传播政策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三大内容。一是确定大众传播体系发展的基本政策的问题；二是根据既定的基本政策来进行全面策划的问题；三是如何根据既定计划，建立有效的大众传播系统，以协助国家建设的推行。

下面我们引述一些例子加以论明。

譬如说，在一个领土广阔，经济落后，科技与教育水准不高的新兴国家里，那一种大众传播系统，应该加以优先建立和发展，才能达到有效向全民传播，协助国家建设发展的目标？在多种大众传播媒体中（如传播卫星、微波通讯、电视、广播、报纸等

）那一种媒体最适合自己的国情和特殊条件，发挥最大的效果？这是新兴国家在建国过程中所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印尼於一九七七年八月发射应用的国内传播卫星，便是针对印尼的特殊国情和需要而作的一个重大传播决策的结果。

在新兴国家里，大众传播媒体，应该由甚么人来推动发展？是应该国营还是民办？或是应该采取折衷办法，由国家与民间，各尽所能，分头负责？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性问题的，它不单关系人力财力和效果的因素，也牵涉到大众传播媒体是否应该受到政府严格控制或应该自由开放的政治性问题。随着不同的国情与政体，各国都有不同的施为。不过，那一种办法对国家建设更加有效，这是可以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的。

另一个政策性的问题是大众传播媒体应该集中在一两个中心（如国都或工商业枢纽的通都大邑）发展还是应该分散发展？集中发展不但指媒体本身集中在一两个大城市，而且传播内容的策划和安排，也往往由中央负责，地方无汉过问。这种中央化制度的优点，如从大处着眼，则是国家政策的发布以及国民精神的建立，能够通过由上而下的方法，迅速展开。缺点则是缺乏地方内容和地方色彩，抑制了独立个性的产生。相反的，如让大众传采媒体分散和独立发展，在小市镇或远僻的地区建立起来固然可以在内容方面，配合当地的环境和需要；但如果控制不当，可能会出现地方思想过份浓厚，而与中央分庭对抗的不良现象。如何协调以求两全俱美，这是需要研究的课题。

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里，传播语言（包括方言）的选择，是决定传播内容和传播媒体发展的重要因素。传播语言的选择，跟立国的基本政治文化政策分不开，那一种语言或方言应该突出应用，那一种语言应该避免强调，必须根据基本国策，加以决定。另一方面，从实际的观点来看，也必须有所选择，才能使有限的资源（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得到合理的分配，发挥传播媒体的最大效能。广播与电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不加选择，希望将全部语言或方言都派上用场，那根本是无法应付。

外来大众传播媒体（如电影，报章，杂志，书籍等），外来电视节目以及外国通讯社新闻的输入，是否应该加以控制或如何控制，这也是政策性的问题。这个问题，除了必须照顾政治，文

化和社会等因素之外，还得照顾自己人力，财力和技术的因素。以娱乐性电视节目和国际新闻来说，前者的主要供应来便是美国，后者则几乎由四大国际通讯社（美国的合众社和美联社，英国的路透社和法国的法新社）所垄断。如果一个新兴国家要限制或控制这些外来品的输入，自己有没有办法弥补这些供应需求？这些正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近年来所积极讨论，希望能够加以解决的问题。

不同的传播媒体，有不同的功能和效用。譬如说，以目前的一般情形看，报章基本上是传播消息（全面性消息和深度性消息）的媒介，而电视基本上是娱乐性的媒介。这当然是人为的结果。不过，问题是电视为甚么不能拔出更多的时间，来全面报导新闻，分析新闻呢？实际上，由於电视具备视和听的优点，它能够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效用。

最后，大众传播在国家发展（包括物质方面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方面的社会改革）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确定的政策性课题。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的相因关系，早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末期这十多年间，已经有相当广度和深度的研究。美国大众传播学者 DANIEL LERNER 所著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1958）（《传统社会的消逝》）和 WILBUR SCHRAMM 所著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1964）（《大众传播媒体与国家发展》）两书便是这方面的经典著作。

不过，由於许多新兴国家和大众传播人员（如新闻从业员等）对於大众传播媒体在国家发展工作中所能发挥的补助和引导作用，未加重视和善用，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这个问题，必须进一步加以探讨。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包括 LERNER 和 SCHRAMM）过去对这问题的研究，主要以西方的经济体系，发展背景和传播理论为根据，似乎不能适用於第三世界的国家，因而有新观点的提用。实际上，LERNER 和 SCHRAMM 二人在一九七六年联名编撰的新书 COMMUNICATION AND CHANGE: THE LAST TEN YEARS AND THE NEXT（《传播与变革：过去十年的发展和未来十年的趋向》），已经修订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提出了新的看法和理论。

上面所提，只是大众传播政策研究的一些重要范围和问题，这些例子，可以不断引伸推广。

目前，推动大众传播政策研究最得力的有两个机构，一是联合国的文教机构，一是夏威夷的东西文化研究中心的传播研究所（EAST-WEST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EAST-WEST CENTER）。这两个机构，近年来已经出版了几十本有关这个问题的专著，不但从学理上讨论大众传播政策，策划和大众传播系统发展的问题，同时也从实际应用上，提出一些如何决策，如何策划以及如何发展的方案求模式，希望有取於第三世界国家对这方面工作的推行。

去年（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间，联合国文教机构假檳城理科大学主办了一个为期四周的亚洲区大众传播策划研讨会，针对该机构传播学专家ALAN HANCOCK所提出的一套大众传播策划方案，提出讨论和求证，就是这方面研究工作的一部份。参加研讨会人士，除了联合国文教机构和东西文化研究中心传播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外，也包括亚洲十二个国家的大众传播学者，大众传播机构或单位的高级负责人和经济发展策划人士。笔者适逢其会，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以新加坡来说，我们对本地大众传播问题的研究，还处於刚刚起步的阶段，理由是多方面的，一来大众传播研究这门学问，对我们来说，还是新兴的东西，未受国人注意；二来新加坡立国不过十二年，经济建设，是当务之急，大众传播虽与国家发展有关，但还不是主动力量，未受重视，也是常情；三来以大众传播学立场而对大众传播研究产生兴趣的学人，屈指可数，未能产生推动力量。

就目前的情形说，我们对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和读者、听众以及观众调查的工作，已经开始了第一步，至於大众传播政策的研究，还完全付诸阙如。

新加坡大众传播史的研究，也还仅仅限於报业史的范围。有系统，有深度而又较全面的著作，要算陈蒙鹤的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报，一八八一—一九一二》）。英文报业史方面则以A KANAYSON的THE NEWSPAPERS OF SING-

APORE, 1824-1914 和 C A GIBSON-HILL 的 THE SINGAPORE CHRONICLE 两篇论文较有份量。LIM PUI HUEN 所编 NEWSPAPERS PUBLISHED IN THE MALAYSIAN AREA 则是最完整的新马报章编年索引。

杂志史方面，虽然还没有专书出现，不过方修和苗秀等文艺史研究工作者在编写新马华文文学史的过程中，为华文文艺杂志的发展，发掘和保留了许多资料，为杂志史（包括非艺杂志及其他语文杂志）的研究铺了路。

书籍出版方面，则有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图书馆馆长 CECIL K BYRD 的 BOOKS IN SINGAPORE（一九七〇年出版）。不过，这本书属现况调查性质，不是历史的研究。

南洋大学大众传播学组师生则在各语文大众传播媒体（包括报章、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电影、公共关系、广告等）现况方面，做了两次全面性的调查。

至於读者，听众和观众调查研究的工作，主要由商业性的市场调查机构推动，以应付广告商，广告客户及大众传播媒体的营业需求，不是从学术观点或学理方面做研究。

内容研究方面，则有黄顺忠的博士论文《新加坡各语文报章国际新闻报导的比较研究》（一九七〇年）。

一九七〇年二月，由新加坡政府及德国 FRICH-EBERT - STIFTUNG 基金联合赞助的亚洲大众传播研究和资料中心（ASIA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RE）在新加坡成立，工作偏重在亚洲区大众传播当前问题的探讨和大众传播资料的收集和交换，出版了《新加坡大众传播研究书目提要》（MASS COMMUNICATION IN SINGAPORE-BIBLIOGRAPHY SERIES No 6），是唯一以新加坡问题为对象的研究成果。

根据上述，我们知道，我国在大众传播研究方面，还是一片荒原，有待开垦耕耘。就这方面来说，新加坡各语文源流的大众传播机构和新加坡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由於切身的关系，可以发挥带头催动的作用。新加坡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现在以拓荒者的精神，出版新闻研究年刊，值得赞扬和支持。

原载新加坡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年刊《报人》第一卷第一期
1978

从《察世俗》到《东西洋考》

—马、印、新华文杂志发源研究

绪言

从1815年到1837的22年间，马六甲、巴达维亚及新加坡三地，先后出现了四份宗教性的华文杂志，即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及《天下新闻》，巴达维亚的《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以及新加坡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这4份华文杂志，虽属宗教性质，但在该出版地的大众传播史上，都占有开山拓荒的地位，非常重要。如1815年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马来西亚的第一份华文杂志，1823年创刊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是印尼的第一份华文杂志，而1837年在新加坡复刊的《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则是新加坡的第一份华文杂志。

此外，《察世俗》虽然是在马来西亚创刊发刊，但是由于它是一本华文杂志，而且主要销售地是中国，因此受到中国大众传播史家的特别重视，被誉为「中国近代杂志的第一种」、「中国近代报业的开山鼻祖」。至於《特选撮要》及《天下新闻》等，也在中国大众传播史籍上占一席位，被推介为「外人在华发刊」的早期华文杂志。

不过，中国大众传播史籍在介绍这几份华文杂志时，除了对《察世俗》的分析比较详尽之外，对其他杂志，则只及於它们的出版年代，出版人以及内容这些非常简单的资料。而且在介绍这些资料时，一般上将各杂志独立处理，没有连串起来，加以说明

他们之间的关系，使读者产生印象，以为这些杂志彼此间没有任何关连，以为它们之在南洋各地先后出现，只是偶然的事情，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或相关因素可以追寻，这是中国大众传播史籍的缺点。

本文的目的，是对这4份华文杂志发刊的背景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作一个总的介绍，以说明现代华文杂志发源于南洋一带的理由，同时也说明这4份杂志虽在22年间，先后在不同的地点出现，但它们之间，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是互不相关，各自独立的杂志。

背景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接触，最少已有二千年的历史。西洋文化的输入中国，自然也非止於一日。在这二千年的中西接触中，基督教的入华传教，是中西接触的一个重要成份，而现代华文杂志的出现，也是基督教传入中国后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西方文化、制度介绍到中国的部份内容。

基督教的传入中国，始於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的景教。至唐朝会昌五年（845）景教被断禁时止，在中国流行凡二百馀年，这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第一阶段。

景教能够在中国流行二百馀年，主要原因，是景教受到唐朝官民的优容，自由发展。如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建立的景教碑（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並序」），纪颂当时景教之盛况，可见景教受到优容情形的一斑。

元朝入主中国，前后有百年历史（1277至1367）。由於该朝对宗教采取开放政策，更由於西征结果，罗马教士盛入中国，使到基督教重播中土，广泛流行。不过，好景不常，元朝於1367年覆灭后，基督教失去政治性的庇护。更由於土耳其兴起，阻塞中西交通孔道，流传一时的基督教，便告消失。这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第二阶段。

明朝（1368至1644）万历八年（1580），意大利天主教徒利玛窦由澳门入华传教，开启基督教徒在华活动的第

三阶段。这一阶段，延绵二百余年，至雍正、乾隆年间消失。基督教在中土第三度消失，主要亦受文化与政治因素影响。首先，基督教在中国三度盛行之后，至康熙年间，由於信奉基督教的中國教徒继续敬天祀祖尊孔，引起西方在华基督教士的争议，进而导致罗马教皇的干涉，下命禁止华籍教徒敬天祀祖尊孔。这场纠纷引起康熙的反感，结果出现反教暗流，基督教在华活动，受到挫折。及后雍正继位（1723至1736），因为政治斗争关系，以严酷的手段对付敌党，连骨肉手足，亦多不能善终，影响所及，连支持雍正政敌的基督教徒，亦受清除。雍正反教的最重要措施，便是在登基的那一年，下诏禁教，除北京城外，不准任何传教活动，所有教堂，一概没收。乾隆时代（1736至1796），取缔更严，内地教士，一经查出轻则驱逐，重则正法。盛行一时的基督教活动，几至根绝。

清嘉庆十二年（1807），英国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被派入华，试图重振传教活动，这是基督教入华活动第四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延续至今，前后达一百七十馀年，基督教活动，在目前的大陆中国，可以说是已经式微，但是在台湾、香港、澳门，仍然盛行。

基督教第四度入华，正是促成本文所要介绍的四份华文杂志在马六甲、巴达维亚及新加坡三地出现的基本因素。

上文已经指出，清朝禁教政策，在雍正、乾隆两朝，已严厉执行。及至嘉庆（1796至1820）及道光（1820至1851）早期，亦仍然仿照前朝旧律，严禁外人传教活动，如1805年北京城内的清除基督教残馀势力事件以及1811年嘉庆皇帝再度下诏禁教，重申不准外人传教及刻印基督教宣传文字，违者处以重刑等，可见当时清朝的反教情绪。而伦敦教会却在这个时候遣派马礼逊入华传教，无如以卵击石，自寻死路。

不过，对马礼逊来说，他也不是无备而来。基本上，他知道当时在华传教的困难，所以采取了一种试探态度及能屈能伸的精神，来执行他的任务，进行活动，避免无谓的牺牲。首先，他入华的第一个目的地不是广州或其他沿海市镇，而是地处一隅，还没开发的澳门。当时的澳门，固然是西商入华的歇脚站，清政府

对西人在澳门的活动，似乎比较宽容。可是，马礼逊没有预料到，由於天主教与新教几百年来的仇恶，使到他在澳门的活动，不容於天主教徒，结果被迫离开澳门，於1807年9月冒险进入广州。他在澳门的居留期间，前后不到一个月。

1808年中，满清政府与英国发生纠纷，所有居住在广州的英国人，被令移居澳门。马礼逊亦因此回到澳门。为了暂时避免风险，他回到澳门后，专心学习官话及广东方言，並进行翻译新约又编写基督教传教小册的工作。

1809年2月，马礼逊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聘约，出任该公司的中文翻译员，作为继续传教活动的掩护。他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前后达七年（至1815年止），这期间，他在家中秘密传教。

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当然非常不理想。不过，在英国伦敦教会及马礼逊的信念中，中国人这时候正需要基督福音的披照。因此，不管多么困难，也在所不辞。所以，经过五年的活动后，英国伦敦布道会及马礼逊不但对在华的传教工作一点没有悲观，布道会反而觉得需要增援马礼逊的在华活动，决定於1812年9月增派年轻教士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前往澳门，协助马礼逊，推广工作。

米怜在1813年7月四日抵达澳门。他在澳门的遭遇，跟马礼逊一样，亦因受到天主教徒的挑衅，被澳门葡督迫令在廿四小时内离境，米怜於是在7月20日离门澳门进入广州。为了避免满清政府的注意，同时也为了掌握机会，先学好中文，米怜在广州的首半年期间，专心一志，学习中文，暂时将传教工作，搁置一旁。

在这期间，马礼逊对於在华传教的工作与方针，作了全面的检讨，並决定了长远的发展方向。

马礼逊认为，当时在澳门及广州传教的最大阻力，自然是清政府的禁令。其次，天主教徒的敌对态度及东印度公司的保守政策，（后者为了保护在华贸易利益，不支持传教工作），也是重要阻力。这些因素，使到直接的传教工作（如集会、布道等）固然无法展开；甚至连辅助性的工作（如学习中文、刻印基督教宣教文字等），也困难重重，必须秘密进行。因此，在澳门及广州